
理论与应用 ● ● ● ● ●

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涵： 基本命题与学术使命^{*}

——兼评柯布利著《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涵》

方仪力

摘 要：生物符号学以“连续论”为理论基石，将文化放置到自然中加以研究，有效地消弭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抽象的“意义”转化为真实世界中人类的认知和体验。这不仅为理解“存在”“自我”“理性”等重要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事实材料，更强化了符号学研究的文化意涵，揭示出符号学对文化和文化现象的解释效力。本文基于对柯布利等生物符号学家相关理论的阐释和反思，尝试重返生物符号学的基本命题和学术使命，也即：其一，以“认识”为目的重置意指研究范畴；其二，秉持“连续性”，彻底抛弃“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其三，强化“行动主体性”概念以建构“人类意义共同体”，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以此，得以进一步明确当前符号学在进入“总体符号学”研究阶段后将生物、认知和伦理不同层面融为一体的研究范式，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中意义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

关键词：生物符号学，文化意涵，自然，文化，跨学科研究方法论

^{*} 本文为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成都本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2024BS062）前期成果。

Propositions and Objectives of Cultural Biosemiotics: Reacting to Paul Cobley's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Biosemiotics*

Fang Yili

Abstract: Biosemiotic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divide between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istic culture by using “continuity”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ituating the studies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phenomena into nature, it successfully address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emiotics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thus enhanc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Semiotics. This article, based on reflections of how bio-semioticians like Paul Cobley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cultural research within biosemiotics, revisits th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objectives of Biosemiotics, namely, reframing the scope of semiotic inquiry around “knowing” as its primary goal; embracing continuity to engage a dialogue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agency to construct a “shared human meaning community” to move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dimensions could be taken as a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to clarify how Semiotics in its the current turn to “Global Semiotics” integrates biological, cognitive, and ethical approaches as well.

Keywords: Biosemiotics, cultural implications, nature, culture, methodolog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DOI: 10.13760/b.cnki.sam.202501013

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是符号学内部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因其研究对象广涉交流、记忆、体验、心智、范畴化等多方面内容，故在研究内容上与语言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多有交互，可用“边缘性学科”来加以描述。边缘性也同时意味着极强的可塑性，正因为与他学科多有结合，生物符号学从哲学、文学、文化等层面极大地扩展了学界对“意义”的理解，成功地将“人类意义共同体”塑造为意义问题的讨论语境，从而为智媒体时代重新定义“存在”“自我”“理性”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导向。如果社会科学

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且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高丙中，2019，p. 2），那么生物符号学的使命和意义正在于对意义问题的探索和阐释。在生物符号学内部，意义问题被放置在了真实的物理世界中，抽象的意义转化为真实世界中人类的生活体验，这不仅为超越细微琐碎的知识，抛开所谓价值高低界定，以及重返人类自我体验和自我认知提供了事实材料，更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理解意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深入理解生物符号学家的意义探索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2016年以来，以柯布利为代表的西方学界生物符号学家不断强化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涵，尝试在清理西方生物符号学学术史的基础上，反思生物符号学如何作为“理解文化的钥匙”，明确符号对文化的全面解释效力，以展示真实世界中符号表意的本质，强化“研究符号即是研究生命”的符号学基本原则。柯布利等人的研究既是生物符号学内部的文化转向，亦是符号学与文化研究跨学科结合的方法论镜鉴。因而，思考柯布利等学者如何开拓生物符号学内部的文化研究边界，或能更好地理解生物符号学的基本命题和学术使命，也即：其一，以“认识”为目的重置意指研究范畴；其二，秉持“连续性”，彻底抛弃“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其三，强化“行动主体性”概念以建构“人类意义共同体”，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在此基础上，亦能进一步明确当前符号学在进入“总体符号学”研究阶段后将生物、认知和伦理不同层面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范式，并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中意义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

一、以“认识”为目的重置意指研究范畴

由于符号必须在特定的系统中才产生意义、意指作用和意指效力，因而对符号概念的认识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符号研究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将符号与象征并置，斯多葛派把符号视为“语词”和“外部世界的实存物”，索绪尔将符号看作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共同产物。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符号－象征理论，还是索绪尔社会－心理符号思想都暗示了人类语言是首要的符号系统，“语言比任何东西都适宜于世人了解符号学的性质”（索绪尔，2009，p. 37）。符号学由此成为专门研究人类符号的学科，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人类语言（verbal）和非语言（non-verbal）行为组合系统中的规则、意义和关系等问题。然而，上述认识强化了话语的建构性，将一切意义建构简化为语言

或话语建构，从而否定了符号的解释效力，窄化了符号学的研究范畴，将人类从其他有机体的符号现象中抽离出来，造成了人类与非人类生物、物质与心灵的二元对立。生物符号学的产生正是为了消弭物质与心灵、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鸿沟。故而，生物符号学旗帜鲜明地反对上述二元对立，提倡在自然领域中的符号表意过程。换言之，过往的文化研究仅仅是针对特定人类社会和主导文化的片面性研究，生物符号学在扩大意指研究范畴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文化意涵。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以“认识”为目的的意指研究范畴是生物符号学家开展文化研究的起点。对生物符号学家而言，符号和符号过程都需要放置到自然中加以理解。诚如柯布利所总结的，“生物符号学认为生命是连续的，他们研究自然领域的符号过程，以摒弃或者修正以上的二元对立”（柯布利，2023，p. 3）。既然文化是自然中一种特殊的现象，那么文化研究就不仅需要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符号和符号过程，更需要重新理解文化，文化不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既存事实，而是人类在自己独特的环境界发展认知能力的结果。《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涵》是生物符号学内部探讨文化问题的代表性著作，可为学界理解生物符号学文化意涵提供基本的理论参照。该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共8章，前三章看似在梳理生物符号学的学术史，实则在用过往生物符号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人类的生物学基础即文化的基础，文化和文化现象是人类的认知和内符号现象；后五章尝试以“伦理”“审美”等文化研究的特定对象说明，从生物学角度用自然符号取代文化符号，对文化的解释会更全面。质言之，柯布利所主张的生物符号学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将人类和非人类的意义和符号过程同时纳入考量的研究。

但仍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并置考察人类和非人类的符号和表意过程，是要在反对人类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差异性过程中强化生物符号学自身的“认知导向”。所谓的“认知导向”是指生物符号学以“识”（knowing）为其研究的主要目标。因为任何物种都生活在适应其自身生存的世界中，生命体如何在自身世界中认识、发现、体验应该被视为符号学研究的第一要义。以人类为例，虽然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共同居住在同一个环境界（Umwelt）中，但人类所认识的客观世界与由感觉器官生成的体验有关，人类不仅拥有语言交流的能力，更拥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能够区分符号、对象和事物。迪利曾以“冰山”为例解释人类对符号对象的认识。漂浮在海面的冰山一角最先作为一个符号对象为人所识别。但与非人类生物不同的是，人类除了能识别到作为实存物的冰山，还能体验和识别到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并进一步引

发其他感知。这样一来,不仅“冰山”成为符号,个人识别到海平面下的冰山等感觉也同时成为符号。由此可见,“体验”这种以物理和知觉形式展开的方式不仅让符号对象具体化,还进一步区分了行动主体、事物、符号对象和符号。符号对象因而成为“被体验的事物”,我们无需纠结于该事物是否存在。“体验”而不是实存的事物决定了符号生产和符际活动。符号也因而转化为一种关系——尤其涉及符号、对象和事物的关系(柯布利,2023,p.25)。按照柯布利的总结,生物符号学不是用交流性符号来解释自然的问题,其基本任务是理解发生在自然界中的符号“体验”,理解有机体如何“认识”世界,以及最高级的有机体如何拥有“认知”(柯布利,2023,p.35)。

从“体验”和“认知”理解生物符号学,也能更好地认识到生物符号学以描述为主的意义研究路径,并经由意义问题重构意指过程。表面上,从“体验”进入“意义”的方式似乎是唯心主义哲学反复强调的观点,也即,意义通过主观意识建构而存在,是主观的、流动的,个体的意义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息息相关。质言之,对唯心主义而言,“意义”不是物质世界的固有属性,而是外部世界的附属品。但“体验”超越了传统对存在的认识,将存在分为“独立于心灵的存在”(ens reale)和“依赖于心灵的存在”(ens rationis)。上文所述关于冰山的体验即展现了依赖心灵的感知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存在。按照迪利的描述,人们通过把握作为第一认识对象的存在,使独立于心灵的存在和依赖于心灵的存在之间的差异可辨、可知(柯布利,2023,p.26)。以此为据,“意义是基于感知者的背景体验而被感知到的”,因而“意义是基于共同体验的耦合结果,是所有语言、符号过程的重要基础”(Brier,2008,p.87),不再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符号的意指过程不能通过考察文化和社会规约来展现,意指过程从而演变为行动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对符号对象和符号之间同异关系的认识。

进一步而言,对符号本质、符号对象和意指过程的重新定义扩展了了意指研究范畴。在充斥着各种理论范式的科学研究领域,意义问题需被放置到人类生存的真实环境界加以讨论。如果符号中的关系是语境化的,既可能是独立于心灵的存在,也可能是依赖于心灵的存在,那么讨论符号关系的语境只能是生物体本身的生命系统和其他物质层面,意指过程因此需要同时从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和符号学角度加以审视。巴比耶里(Barbieri,2007)尝试总结了生物符号学的四个面向:生物学家弗洛金的生物化学模型,塔尔图学派和布拉格学派基于皮尔斯和西比奥克理论所建构的皮尔斯-西比奥克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细胞学模型以及帕特提出的内在物理属性模型。

在生物学方面，弗洛金（Florkin，1974）提倡从生命本身来理解符号的意义生成，并明确提出，在分子生物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然的物质现实关系决定的，能指是分子结构的一个方面，而所指是生物活动的一个方面。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因此被消解。在动物符号学方面，西比奥克首先提出了动物符号学理论，强调实存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被观察到的世界”，符号的差异性和意指作用取决于物种特有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Sebeok，1988，pp. 73 - 74）。故而，是将广博的自然界还是特定社会抑或特定文化作为符号系统，成为区分生物符号学和其他符号学的主要标准。从遗传的角度而言，细胞由基因型、表型和核苷酸序列构成。遗传仅需要依靠作为遗传密码载体的核苷酸序列，而不依靠任何所谓的“解释者”。细胞学重新定义了符号的三元关系，并提出最简单的符号学系统不包含解释项，仅仅由符号、意义和符码构成，这说明没有解释也同样存在符际过程（semiosis）。帕特从“涌现”（emergency）的角度强调符号和物质的相互依存关系，生命系统中存在信息处理层级，符号和物质共同存在于生命系统中。生物符号学的四个层面皆能说明“研究符号就是研究生命，研究生命就是研究符号”（柯布利，2023，p. 167）。对意义的理解以对生命的理解为基础，开展意指研究的语境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生命系统和物质层面，是由生命体的相互作用涌现的符号过程。

二、以“连续性”为理论基石重审文化和文化现象

从生物体和生命的角度理解符号、符号对象和符号关系不仅重置了意指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符号学对文化意涵的认知和研究范畴。文化意涵依靠符号和符号系统表征，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过去10年，除本文关注的《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涵》外，另有《地球预想：生命、文化与生物符号学》（2016）一书是符号学内部关于生物符号学文化意涵的专门讨论。两本专著虽然都反复强调自然之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但后者主要集中讨论欧洲文化，以英、德等日耳曼族群的生命与艺术融合为研究对象，呈现出明显的日耳曼主义视角（Hope，2017，p. 404）。相较之下，柯布利的著作更注重学术史梳理。该书采用渐进方式详细讨论了文化与自然结合的可能性和研究进路。而与过往符号学的相关文化研究相比，柯布利提倡的生物符号学视域下的文化意涵探讨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连续论”角度将自然纳入文化研究中，避免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裂；其二，以“后人本主

义”(post-humanism)态度开展重视体验和主体性的文化研究,避免怀疑、颠覆、叛逆等后结构主义倾向;其三,呼吁“平等竞技场”(levelling of the playing field)效应的文化价值平等原则,避免过往以权力或意识形态为关注对象的话语研究。

如果说“生物符号学是理解文化的钥匙”,那么“连续性”就是生物符号学理解“文化”的理论基石。所谓“连续性”是指自然的连续性。而按照柯布利的界定,“连续性”是先天和后天、自然与文化、物质与心灵的统一,是“跨越自然的符际过程连续性”,万事万物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柯布利,2023,p.3)。基于“连续性”概念,生物符号学进一步发展了皮尔斯的“连续论”和西比奥克的自然主体理论,并为弥合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分裂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连续性”理论是对皮尔斯“连续论”(synechism)思想的承继。皮尔斯将符号表意理解为一个连续性过程。按照皮尔斯的划分,“符号是任何一种事物,它可以使别的东西(解释项)去指称一个对象,并且这个符号自身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指涉(它的对象);解释项不停变成(新的)符号,如此延绵以至无穷”(皮尔斯,2014,p.32)。符号表意通过一个符号导向另一个符号,继而形成了类推的连续性过程。符号关系因而是一种动态关系,符号对象之间存在联系。皮尔斯构建的这种由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组成的三元关系超越了过去二元论的哲学框架,确证了符号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连续性:连续性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也涵盖了符号、心智和物质的相互关系。如果连续性是整个宇宙的基本特征,那么无论是自然与文化,抑或是物质与心智之间应该都存在连续性,因而也就不应该出现截然对立的二分关系。自然与文化、物质与心智应被放置在统一的连续性的解释框架中加以判断。如此一来,生物符号学不仅通过确证连续性超越了笛卡尔以来的心物二分,更在此基础上摒弃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在真正意义上弥合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长期分裂。因此,承认“连续性”即秉持“连续论”思想取消自然和文化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并进一步扩展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范畴。自然与文化熔为一炉,就是生物符号学家在符号学研究中首先强化的“文化意涵”。

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斯诺(C. P. Snow)认为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分裂,科学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从生物符号学的视角看,两种文化的分裂主要来自过往的人文研究对自然的忽视和对连续性的否认。人文研究不承认物理环境的意义,只关注人类在社会实践中

的意义,无法与科学研究相互协作。但一方面,在现实世界,符号活动首先存在于生命关系和普遍的自然界中,随后才延续到人类的文化表现中,因此对生命的理解、对意义的审美化,甚至对道德和伦理的理解,都需将自然的连续性作为认知逻辑前提。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并无二致,无需截然区分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体,也无需划分对象。因此,否认人类作为生命体的连续性也就无法理解任何形式科学研究的意涵。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和非人类有机体都生活在一个连续性的符号世界,“进化”并不能完全概括人类作为生命体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能细致地描绘人类如何有意识地识别、体验、感知和调整环境界,并创造性地改变自身身处的环境。缺乏对自然的观照,“文化分析即是在真空中进行,对文化中内嵌的部分自然世界的思考充满偏见”(柯布利,2023,p.40)。换言之,文化是自然的延续,而不是割裂的对立面。生命系统中的符号关系构成了基础性层面,而人类文化——包括伦理、语言、艺术等复杂系统——也是在这种符号关系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一直以来,“文化”都是一个多向度的复杂概念,在今天,“文化以尽可能广的方式被定义,涵盖全部的生活方式与实践”(Cobley,2008),包括日常生活、宗教仪式、音乐雕塑等各个领域。学界对于“文化意涵”存在多向度的理解层面。但对生物符号学而言,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更好地描述内在于生命过程中的符号关系和意义生成路径,任何解释都是无效的。从连续性角度描述符号系统的生物学起源能解释“文化”的本质,即“文化”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是生命体适应环境的方式和实践。人类的文化实践并非完全独立的新的创造,它与自然、环境界、其他生命符号息息相关。这也解释了生物符号学为何并不过多强调符号在解释人类文化深层结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解释效力。无论是群体中的权力斗争,抑或是个人和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都与特定符号系统内部的“规范”“约束”“压抑”相关。缺乏对自然的理解,也就无法理解文化意涵。

与传统符号学不同,生物符号学不把如何解释意义作为符号研究的唯一目标,于它而言,描述与解释同样重要。或可以说,生物符号学家所强调的“文化意涵”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从自然到文化的符号过程描述,也即,用连续性视角描述文化中的一切符号现象,却不致力求得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正如符号学家霍普所言,“生物符号学在描述、解释和诠释生命系统内各种符号过程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但对如何解释生命系统中的语言、符号、政治挪用兴趣不大”(Hope,2017,p.398)。然而事实上,任何生物符号学家都不能否认,以人类语言和人类文化为焦点的传统文化研究在解释语言和行

为复杂性上产生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因而借鉴文化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叙述方式以及对文化复杂性向度的分层研究有利于生物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法瓦鲁所言，“生物符号学同样需要人文学科来超越自身的概念局限”（Favareau et al. , 2017, p. 14）。

三、以“自然主体”为理据建构“人类意义共同体”

从连续性视角审视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自我”（selfhood）和“主体性”（subjectivity）亦需要加以重新界定。文艺复兴以来，自我和主体性相关研究在文化研究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认同的讨论，还是关于个体如何参与社会文化构建的分析，抑或是针对不同群体文化消费、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解释，都无法脱离对“主体性”概念的审视。“主体性”概念不仅将个人、群体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将具体的行动模式、社会参与和抽象的个人认同、文化观念加以结合，揭示了不同文化的特异性、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文化认同的流动性。傅其林认为，“不理解主体性，就无法触及当代不断推进的文化研究热潮”（傅其林，2007，p. 131）。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对自我和主体性的理解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

然而从笛卡尔到弗洛伊德，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绝大部分主体性讨论都是以大陆哲学为主导，体现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唯名论”立场，认为知识、权力、意识形态都是通过话语建构的。这不仅误解和歪曲了语言的源头，也将语言限制在了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柯布利，2023，p. 68）。生物符号学以“连续性”为理论基石，从反思“主体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出发，提出“自我性”与“主体性”都不能完全表征人自身的能动性和行动力，故而提倡用“自然主体”概念取代语言和政治意义上的“话语主体”和“权利主体”。显然，“自然主体”概念是对文化符号“生命价值”的强化。

事实上，由于生物符号学意义上的连续性首先指向人类在先天和后天同时存在的连续性符号过程，自我和认同问题也同样以连续性为理论基石。生物符号学的“自我”概念继承和发展了西比奥克的“连续论”。西比奥克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杂文本，其在先天和后天（或者说在自然界中微不足道，却被人类学家隆重地分为文化的片段）的共同作用下，被编码和决定”（柯布利，2023，p. 3）。换言之，“自我”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人类的自我首先是从细胞开始的，细胞间通过免疫系统和焦虑识别了自我，区

分了他者。例如，细胞受到威胁时，免疫系统就会被激活，有机体选择更有意义的方式适应新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不是由文化语境塑造的，也不是由语言来表征的，而是有机体有意识地去识别、体验环境界，接受适合自己的符号，再进一步生成或流通新的符号。符号系统中的主体行为伴随着生命系统的进化而变化。因此，“自我”是复杂符号过程的产物，包括生物免疫反应和在社会环境中的符号过程，它是人作为生物的符号自由。

强调“自我”的生物学意涵同时改变了“主体性”概念的内涵。“主体性”概念与古代社会的崩塌关系密切，因而传统意义的主体性通常与理性建构相关，聚焦于人作为行动主体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决定能力。但在索绪尔的符号思想影响下，语言成为观照主体性的场域。索绪尔认为：“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2009，p. 157）任何思想都需要借助语言才能呈现，语言被视作思想表达的工具。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将语言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试图通过语言来认识形而上学等问题，忽略了符号在生物学和自然界中的潜在功能性。主体性与其他特质一样，都是通过语言，被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等外在因素塑造，不是人固有的先天属性。德里达和福柯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从话语分析和社会实践层面理解主体性，后殖民主义从文化抵抗角度阐释主体性，女性主义从性别和身份在特定社会的表演理解主体性。主体性内在的不确定性、动态性被无限放大。然而，从连续性角度来看，话语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主体性的复杂内涵。当“主体”不再是狭隘的人类主体的代名词，而是符号过程，在符号过程中发展符号识别、体验、解释、反应能力就是行动主体的主体性。这样一来，认识和阐释行动主体的内在驱动、伦理关系和所受限制与语言无关，主体性需要在生物环境中加以理解。生物符号学反复强调，人类的语言的特异性体现在人类能用语言虚构现实，能认识到符号的第三性关系，即符号存在的潜力。索绪尔创立的符号学以“音响”和“语词”为基础，声音与语言存在线性的编码和解码关系。显然，线性的编码和解码不符合自然中的符号过程。按照索绪尔的定义，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就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才产生的（索绪尔，2009，p. 160）。在索绪尔符号学的框架下，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它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依赖于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但在现实中，人类首先思考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继而挑选、排列语词，再说出生排列后的语词。听者根据听到的声音还原

语词,理解并接受说话者的思想。意义产生过程中的解码和编码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对所处环境的认识、体验、反应过程。

用“自然主体”取代“人的主体性”反驳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消解了过去被无限放大的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在此基础上,“人类意义共同体”取代了特定话语成为意义讨论最为恰当的语境。如果认识到“人”不再是完全自足的行动主体,而不过自然世界的一种生命体,同时受到环境界和自身的约束,自我的主体性就不能被视为个体在自我决定时候的自由程度,而是一个被整体环境抑制和约束的结果,约束主体抉择和行动自由的诸多限制也因此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内容。据此,“基于理性的、统一的意识而做出的合理的道德判断,并不能产生伦理”,“伦理是人类环境界的产物”(柯布利,2023,p.87),审美行为是人类选择装饰自己所处环境界的生存方式。过去在伦理研究或审美研究中用于凸显自我意识或文化维度的“他者”概念也得到重新定义。“他者”的内涵从过去自我的对立面转换成包括自我在内的环境界中的一切事物。自我与他者之间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积极、互助的关系。生物符号学也经由自主性强化了符号学对伦理、审美等问题的解释力度。而从上述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对符号、符号对象、符号关系和符号过程的认识都需要以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为前提,“意义”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人类在共同的环境界通过共同的认识、体验和解释产生的结果。

结 语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将“范式”定义为:“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时间里,它们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库恩,2003,p.4)“范式”定义表明,特定科学研究是遵循相同的过程学习到有关这一领域的相关知识的。生物符号学继承和发展了皮尔斯对意义问题的哲学思考和西比奥克的“内符号”概念,用描述的方法将多学科视野融为一体,挑战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界对意义问题采用的批判式研究路径。在探讨意义时,生物符号学将对“自然”与“文化”的讨论熔为一炉,直面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从而完成了对自然和政治社会等现实危机的超越,指向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等深层关怀。就方法而言,生物符号学通过强调连续性,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决定论、语言决定论等一切可能导致二元对立的思想,对符号、符号关系和复杂符号过程的理解和解释被

放置到真实的自然环境,“人类意义共同体”替代了传统意义的文化认同和族群概念成为意义建构的基本出发点。从范畴来看,生物符号学将生物学视角引入符号学,从他学科范畴重新阐释了符号、符号对象、符号关系的本质。人类的体验和知识向度亦通过生物符号学的诸多发现得以扩展。

但正如柯布利所言,“生物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旧的’符号学。然而,符号学欠缺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意涵”(柯布利,2023,p.44)。提升既有符号学研究的文化意涵顺理成章地成为生物符号学研究的学术使命。2016年来西方符号学界的相关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生物符号学的文化转向(Favarea et al, 2017)。或许因为生物符号学过于强调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从属关系,忽略了文化对自然的反作用,现有的研究仅仅是从自然到文化的单向度研究。但事实上,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福柯都未忽略人作为生命体的自我感受,文化研究学者早已借用生物符号学发展了包括“文化杂糅”“文化挪用”在内的理论(Stross, 1999)。作为生物符号学家的霍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似乎我们如此急于将符号学重置在生命世界中,以至于在此过程中完全忽视了语言、政治和符号层面的复杂问题(Hope, 2017, p.405)。据此而言,对生物符号学的认识应该不止于对其开展基本的学术史梳理,也无需过多纠缠于“生物圈”“生命体”的概念,或反复强调人类与其他有机体或生物与文化之间的同异关系,而需在充分理解生物符号学自身的方法论意义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生物符号学对文化意义的研究,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从“自然”和“文化”的交互出发扩展意义研究范畴。

参考文献:

- 傅其林(2007). 主体性(subjectivity). 载于王晓路(主编).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 131-144.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高丙中(2019). 总序. 载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 1-5.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柯布利, P. (2023). 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涵(胡易容,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库恩, T. (2003). 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能、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皮尔斯, C. S. (2014). 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索绪尔, F. (2009).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Barbieri, M. (2007). *Introduction to Biosemiotics: The New Biological Synthesis*. Dordrecht: Springer.
- Brier, S. (2008). *Cybersemiotics: Why Information Is not Enough!*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Favareau, D. , Kull, K. , Ostdiek, G. , Maran, T. , Westling, L. , Bobley, P. , Stjernfelt, F. , Anderson, M. , Tonnessen & Wheeler, W. (2017). How Can Study of the Humanities Inform the Study of Biosemiotics? *Biosemiotics*, 10, 9 – 31.
- Florkin, M. (1974). Concept of Molecular Biosemiotics and Molecular Evolution. In Marcel Florkin & Elmer Stotz (Eds.), *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 1 – 124. Amsterdam: Elsevier.
- Hope, J. (2017). Various Shape of Cultural Biosemiotics, *Biosemiotics*, 10, 397 – 411.
- Stross, B. (1999). The Hybrid Metaphor: From Biology to Cultur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2 (445), 254 – 267.
- Wheeler, W. (2016). *Expecting the Earth: Life, Culture and Biosemiotic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作者简介:

方仪力, 博士,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Author:

Fang Yili, Ph. D. , research fellow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fangyili@ scu. edu. cn